

張效乾與史學教育

程光裕

倡言人人多讀國史

張效乾與史學教育

張效乾（一九一六——一九八六）江蘇省銅山縣人。民國五年三月十日出生於徐州城南馬蘭集故里，自幼資稟聰穎，入家塾啟蒙，悟解力強，讀書過目成誦，甚得塾師誇獎。方屆稚齡，父母先後謝世，由祖母撫養成長。十四歲時，祖母見背，幸有宗親照顧。插班考入銅山縣立實踐小學，畢業後，升入江蘇省立徐州中學，勤習功課，以優等名次畢業。民國二十七年入國立浙江大學文理學院史地學系就讀，其時浙大文理學院，名教授雲集，享譽一時。二十八年文理學院分爲文學院與理學院。文學院院長由梅光迪教授擔任，梅氏學貫中西，二十七學年度擔任大一英文，文學院史地系同學，有幸得在梅氏班上受業。文學院與師範學院的史地系，皆由張其昀教授主持，張氏學術地位，久爲士林所敬重。系內名教授極多，歷史方面，如張蔭麟、劉節、李源澄、賀昌羣、向達等。地理方面如葉良輔、涂長望、沙學浚等，均極一時之盛，張氏在學生時代受名師薰陶，得在史學方面奠定基礎。

三十一年大學畢業，正值對日抗戰最艱難時期，乃相繼應重慶國立第二中學暨國立中央大學沙坪壩附屬中學之聘，擔任教職。抗戰勝利隨政府復員遷京，先後任教於樂羣中學與成美中學。三十八年二月來臺，初在省立臺中高中任教務主任，繼任省立新竹師範學校總務主任，調教務主任，後調爲省教育廳督學，出任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總幹事，頗多貢獻。四十四年二月，應聘在臺北工專授中國近代史。四十八年八月，復應臺灣師範大學史地學系之聘，在該校兼授中國近代史、中國通史等課，同時更在大同工學院講授中國通史。在各校任教數十年，深受學生敬重。七十三年教師節，獲教育部頒發服務四十年資深優良教師匾額及獎牌各一。張氏於國史教育至爲關心，民國六十五年六月發表「國史教學重點之商榷」，略謂「根據我國憲法，教育文化應發展我國的民族精神。我們政府現在建設臺灣，確保復興基地，也是以發揚我國歷史文化，復國建國爲己任。我們講歷史，當然也要以整個民族的興衰存亡爲著眼點」。並提出「激發青年的民族意識」、「中華民族創造的偉業」、「發揚歷代締

造統一的基礎」、「古今聖賢德業或學術的講述」諸重點以爲教學的參考（刊中外雜誌十九卷六期），繼於民國六十六年六月撰「國史教育與民族文化」（道德季刊第七卷第二期），引唐劉知幾史通建置篇：「苟史官不絕，竹帛長存，則其人已亡，杳成空寂，而其事如在，皎同星漢。用使後之學者，坐披囊篋，而神交萬古，不出戶庭，而窮覽千載，見賢而思齊，見不賢而內自省，若乃春秋成而逆子懼，南史至而賊匠書。其紀事載言也則如彼，其勸善懲惡也又如此。由斯而言，則史之爲用，其利也溥，乃生人之急務，爲國家之要道，有國有家者豈可缺之哉？」又引王船山之言：「有家而不忍其家之毀，有國而不忍其國之亡。」從而申論云：「志士仁人所以不願其家毀國亡者，乃因其對國家有真摯之愛！此種愛國真情之激發，絕非被動，乃係自幼及長而受本國歷史文化之薰陶，由認識而瞭解，由瞭解而敬愛。因知無源頭活水，絕無滔滔之長流，無邦國之愛，絕難成麥秀之歌。故國民之愛國心，非自幼培植，由小學而中學而大學，長期受本國歷史文化之浸潤，日久自然情生。」其闡釋國民教育

對於發揚我國文化和培養國民愛國心之重要性至爲明晰。

民族思想激揚動力

又云：「國史教育除對文化之發揚有重要之影響外，而於民族思想之激發，國民崇高人格之培養，亦有莫大之功用。」關於民族思想之激發，引國父中山先生「要救中國，想中國民族永遠存在，必要提倡民族主義。」申言「民族主義之提倡，必以激發民族思想爲要務。孔子作春秋，以內中夏而外夷狄，以今語言之，即中國人要永遠做個中國人，不要數典而忘其祖，內夏外夷之民族思想，即吾中華民族之傳統精神。吾民族之所以綿延數千年而勿替者，即此精神之所致也。要知一民族無思舊之情，絕難啓復興之念。故知激發民族思想，應以國史教育爲動力。」至於國民崇高人格之培養，張氏認爲「最有效之途徑，莫若研讀偉人傳記，歷史上偉大人物之形成，實爲民族文化之結晶，欲明瞭一國民族文化之價值，必須對偉人人生平作深入之研究，而衡量人物，常以立德、立言、立功三者爲準則。偉大人物，每能言爲世法，動爲世表，身後之流風餘澤使人感念之而愈新。現代青年處於物慾誘惑之今日，如能多讀偉人傳記，多識偉人之前言德行，定可增其想像，拓其胸襟，正其知識，植其德行，舉凡不能得之於學校家庭者，皆可於此種書中得之。」全文並以「今日之科學知識雖爲教育追求之目標，但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不容偏廢。物質文明發達之國家，如無精神文明約束之，社會上必

將形成人慾橫流，漫行無際，而精神文明之培養，端賴精神教育，我國最需要者爲民族精神教育，而民族精神教育之推行，必以國史教育爲動力，如能周密計劃，切實執行，則我民族文化之復興，其庶幾乎」作結。

命，也是繼承這個正統思想來發揚光大。」所以我說研究三民主義，應當以中國歷史爲基礎，捨棄中國歷史而來言三民主義教育之推行，無異於沙上樓閣。」可謂語重心長，充分流露出熱愛民族國家文化之情懷！

中華文化永恒價值

民國六十七年七月又作「民族精神與國史教育」（中華文化復興月刊第十一卷第七期）延伸「國史教學重點之商榷」與「國史教育與民族文化」二文要義，並言及國史與三民主義之關係云：「今日我們要推行三民主義教育，把全國人民建立以三民主義爲中心的思想體系，必須加強中國歷史之研讀，因爲三民主義的根基是中國歷史，惟有學好中國歷史，才能明瞭三民主義之偉大性。所以研究國父思想者，應當先研究中國歷史的發展。國父說：『予之革命也，所持主義有因襲吾國固有思想者，有規撫歐洲之學說事蹟者，有吾所獨見而創獲者。』不過他說的『規撫歐洲之學說事蹟』，都是根據中國歷史傳統，而加以分析批評或接受，所以他的思想是完全代表一位中國思想家之本色。現在世界各國研究民族獨立史、民權運動史、民生發展史，都是專門學問，換句話說，探討這幾門學問，都是由研究專史的學者負責。就以我國民族史研究範圍來說，不外中華民族之由來及成分、民族之遷徙、異族之入侵與華化、氏族之原委與譜系之分合等，這都是中國歷史研究的範圍。有人問國父：『先生革命思想之基礎是什麼？』他說：『中國有一個道統，即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、武、周公、孔子，相繼不絕，我的思想基礎，就是這個道統，我的革

張氏研究中國文化史，作「中國文化的永恒價值」一文（民國六十九年六月，史學彙刊第十期），嘗云：「殷因於夏禮，所損益可知也，周因於殷禮，所損益可知也，其或繼周者，雖百世可知也。」孔子這幾句話不獨表露中華民族的潛德幽光，更道出中國文化的永恒價值。」又云：「文化的發展，必須依賴文字的書寫與歷史的記述，所以文史與文化，是屬於一體，不能須臾離的。丹徒柳翼謀（詒徵）先生說：『文字之功用有二：通今及傳後也。草昧之世，交通不廣，應求之際，專恃口語，固無須乎文字。其後部落漸多，範圍漸廣，傳說易歧，且難及遠，則必思有一法，以通遐邇之情，爲後先之證，而文字之需要乃隨世運而生。』（見柳著中國文化史）沒有文字，既不能『通今』，亦不能『傳後』。所以說發展文化，必須依靠文字，有了文字，才有歷史，有了歷史，才能把前人的經驗成就傳給後人。在文化發展一連串的歲月中，只有歷史，才能把人類的天才，解釋清楚。」

「文化的創造，最初肇源都是於少數人或一個人的思想與作爲，這種思想和作爲，終能爲大多數人所接受，這就是人類創造的光輝。此等光輝

，有的成爲珍貴的史料，有的寫成可靠的史實，如果沒有歷史，必將失傳於無形。我們再看有史時代的歷年，實在不及史前時代的百分之一，而人類文化，在有史以來的進步，較之史前時代，真有霄壤之別。此即因一無歷史記載，一有歷史記載的緣故。今後中國文化的發展，只有靠文字與歷史（包括實物、圖片等史料），才能光耀於宇寰。」

發展中心倫理道統

張氏以爲「我國歷代的政治思想、文史、宗教、美術與科技的成就，都是中華民族運用自己的聰明睿智，日就月將，艱難締造而成的。在我國的文化發展中，先總統蔣公認爲是以倫理、民主、科學爲骨幹，但是推進文化發展的中心，是倫理道統。有此中心，則我國一切文化發展，都可以運轉自如，無此中心，必將使國脈阻滯，國本動搖」。關於我國文化與倫理道統的關係，引柳翼謀先生「中國文化西披之商榷」中所言：「我國文化，惟在人倫道德，其他皆此中心之附屬物。訓詁，訓詁此也；考據，考據此也；金石所載，載此也；詞章所言，言此也。亘古亘今，書籍碑板，汗牛充棟，要其大端，不能悖是。戰國時代號爲學術獨立、言論自由之時，然除商鞅反對禮樂詩書善修孝悌廉辯十者之外，其他諸家，雖持論不同，而大端無別。儒墨異趣，而墨家仍主君惠臣忠，父慈子孝，兄弟和綢。」「其於道德，最重義利之辨。粗淺言之，則吾國聖哲之主旨，在不使人類爲經濟之奴隸。厚生利用，善欲

給求，固視爲要圖，然必揭諸所謂義者，以節制人類私利之心，然後可以合羣而匡國。」「由此而觀吾國之文字，其根本無往不同，無論李、杜、元、白、韓、柳、歐、蘇、辛稼軒、姜白石、關漢卿、王實甫、施耐庵、吳敬梓，其作品之精神面目，雖無一人相似，然其所以爲文學中心者，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倫理也。」「太白長吉之詩，或有虛無飄渺不可理解之詞，然其大歸，仍不外乎人倫道德。」「故深於此種中國文學者，其性情亦固以和厚高尚，不致因環境之逼迫，無聊失望，而自墮其人格，以趨極端之暴行。」

張氏云：「柳先生認爲中國人的道德價值，高於一切。他於政教、文學、訓詁、考據，統計諸子的學術思想，最重要的，要表明中國讀書人最高的修養境界，也就是說在中國文化的薰陶下，做人應該具有的一些準則。他的論據是非常正

確的。」亦知張氏對中國文化的觀點。張氏教學之餘從事著作，民國四十七年，撰「中國近代政治史」，列入現代國民基本知識叢書第六輯出版，其後又撰「近代現代中國史」。早在民國四十五年十一月搜集有關紀念徐宏祖的論文十餘篇，爲追念這位「窮途不憂，行誤不悔」的千古奇人，輯成「徐霞客紀念論集」，列入現代國民基本知識叢書第四輯出版。所撰論文，在各報章雜誌發表者不下五十餘篇。重要者除本文引述者外，有「從歷史上看中華文化之發展」、「兩漢時期的中越關係」、「明清兩代與越南」、「艱難開濟十二年」等。民國五十四年至五十六年爲臺北市正大書局編輯職業學校用「本國歷史」與「外國歷史」教科書四冊。七十一年又爲中國文化大學中華學術院主編之「中華百科全書」撰作傳記及國史名辭數十則。其畢生獻身於國史教育，發揚民族文化，努力不懈。

聖文 少年行 全一冊 曹志源 教授 著

文庫 隆重出版 定價新臺幣一三〇元

本書爲旅美學人華府美利堅大學國際關係博士曹志源教授精心傑作，作者以優美的文藝筆調，對數十年來社會動亂，國家災難，戰時年幼從軍，軍中生活趣事，以及戰後大陸赤化之因果關係，有深入淺出極具歷史價值之評析。要目有：①不平凡的時代②溫馨與苦難交織的童年③抗戰中的悲劇④在磨鍊中成長⑤在歷史的逆流中游泳。附錄：金沙坡之憶、祖國的召喚、世界粗話大觀、名人當衆入睡趣聞等篇，篇篇精彩。三十二開本，二百五十頁，十餘萬言，現已出版，歡迎購閱，定價新臺幣一三〇元，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。